

金庸小说中的侠与情

文 / 高启斌 王 彧

摘要：金庸的武侠小说可以视为一部对人性审视的范本，其中的故事情节蕴含了中华民族某些良好品质。这些小说，若用审美的眼光来看，不仅仅是作者对人生的体悟，同时也是作者对传统文化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想象，极富教育的意义。自古我们讲究忠、孝的行为与精神模式，特别是在草莽社会——江湖，有一套与之相应的行为与精神模式，这就是“侠、情”。金庸小说中的“侠、情”实际上是“忠、孝”在社会生活的扩大化，同时在这两个范畴之中达到了自身的辩证与统一，以期人们无论在任何时代，都能发扬中华民族特有的任侠果敢、至情至性的精神。金庸所说的侠士境界，包含“儒侠”、“道侠”、“佛侠”和“丑侠”，强调了人性对于真诚与自由的追求。

关键词：金庸；小说；侠与情

“在中国社会中，‘情义’是最为重要的社会规律，无情无义的人是最大的坏人。”金庸如是说。的确，在他的小说中，那些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英雄”、“侠士”的人无不是饱含深情的人。郭靖对国家的满腔热血、杨过对小龙女至死不渝的爱恋、张无忌对别人嘱托的尽心尽力、萧峰对阿朱唯一而又永恒的追恋、令狐冲与任盈盈知音般的两相爱悦，就连很难称之为“侠”的韦小宝也因为对兄弟朋友的“义气”而显得可爱起来了。可见，“侠”是离不开“情”的，只有那些心中充满了美好高尚情感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侠。

没有“情”的人在金庸的笔下是最可怕的，他们的可怕程度远胜过那些“毒物”、“恶人”、“邪教”中人和“妖女”。“老毒物”欧阳锋为了称霸武林而做下无数坏事，但对儿子欧阳克的爱却令人动容；金轮法王卑鄙下流，但对郭襄的喜爱确实是出于真诚；成昆欺师灭祖，杀人如麻，让人恨得咬牙切齿，但他与师妹无果的爱情还是让人唏嘘不已；叶二娘做出残害他人小孩这等恶行，但对自己的孩子却舐犊情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对情郎忠贞不二；东方不败自残身体，形如鬼魅，但却因为喜爱杨莲亭而终于搭上自己的性命……这些或令人咬牙切齿、或令人毛骨悚然的“坏人”个个都是血肉丰满、真实的、有人性的人，都会在真情流露之时让人心生怜悯、为之动容，其实，他们并不可怕。而金庸笔下最可怕的莫过于那些毫无感情的人，他们被金庸毫不留情地鞭挞、唾弃，就算武功再高明、才智再过人，也注定只能是个奸诈阴险的小人，不可能成为“侠”。公孙止作为绝情谷主，可说是《神雕侠侣》中最无情之人，连妻子儿女也忍心加害，令人发指；慕容复虽然英俊潇洒、温文尔雅，但对于表妹的一片深情却无动于衷；家臣包不同忠心耿耿却痛下杀手，让人鄙夷；岳不群为了葵花宝典、武林至尊的地位痛杀弟子，不

惜牺牲女儿的幸福，见到妻子被俘却不管不顾，这等无情着实让人痛恨。这些为数不多的无情之人才是金庸笔下真正的坏人。

所谓“侠骨柔情”大概说的就是这个罢。无“情”之人不能成“侠”，真正的“侠”必然是至情之人，金庸深知这点。但“侠”作为阳刚之品行，“情”作为阴柔之物，必然有相对立、相矛盾之处。纵观金庸的整个创作历程，就是“侠”之“阳”与“情”之“阴”相结合、相碰撞，最终走向调和、统一的过程。

《射雕》三部曲中的郭靖是早期金庸笔下的侠之大者。他具有高度的道德意识和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为人宅心仁厚、质朴至极，对黄蓉的感情却又极其温柔，为他一身的阳刚正气平添了几分阴柔的魅力。郭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大侠，当“情”和“义”发生冲突时，他即使再心痛也还是会选择割舍“情”来成全“义”。当误解黄药师是杀死六位师傅的仇人时，他尽管心中痛苦万分也还是选择离开黄蓉，为师傅报仇。“郭靖疾伸右手去扶，手指刚要碰到她臂膀，师父的大仇猛地在脑海中闪过，左手疾出，啪的一声，在自己右腕上击了一拳。这是周伯通所授的双手左右互搏之术，右手被击，翻掌还了一招，随即向后跃开。黄蓉已一跤摔倒。眼见她这一跤摔下，登时悔恨、爱怜、悲愤，种种激情一时间涌向郭靖胸臆，他再心似铁石，也禁不住俯身抱了她起来，要待找个柔软的所在将她放下……”书中这一段描写将郭靖心中情与义的冲突展现得淋漓尽致。但郭靖拥有“侠之大者”的风范，也只有在这番内心痛苦的斗争之后方能显现。在他的心中，个人的幸福和情爱与道德、正义以及对师长和国家的忠诚相比都可以割舍。但这并不代表他无情，正相反，郭靖的“侠”之精神是在其“情”的辅助下得以体现的。如果没有“情”，这种“情”与“义”的冲突就不会发生，成就大义如顺水推舟；没有经历过内心“小爱”与“大爱”的痛苦挣扎，就不

能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义”，也注定不能成为“侠”。可以说，郭靖尽管宅心仁厚、胸怀天下，但没有黄蓉的出现，没有经历过个人情爱所带来的甜蜜与痛苦，他是无法成为一代大侠的。

郭靖身上所体现的“侠”是正统的儒家的侠士。^[1]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地助守襄阳……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在郭靖对杨过的教导之中可见其心中根深蒂固的儒家道德观念。这种“侠”，是以“情”为辅并且压倒了“情”的。在郭靖的身上，“侠”与“情”这一阳一阴的矛盾冲突是通过“阳”战胜“阴”来获得的，因此，这里的“侠”是阳刚之气的产物。郭靖的成名武功“降龙十八掌”走的完全是阳刚路线，九阴真经这种“阴性”的武功只是辅助了他的内力，也正暗示了这一点。

到了《神雕侠侣》，金庸对于“侠”的阐释发生了变化，从一开始刚正不阿、严格遵守礼教、以效忠国家作为评判自己个人价值标准的“儒家的大侠”向“道家的侠”发生转变，但是这个转变并不彻底。杨过的个性与郭靖是迥然不同的。他从小混迹江湖，学得一身的江湖之气，年少时油腔滑调、深谙世故、心胸狭窄、任性偏激，这些特质摆在任何人身上似乎都成不了“侠”。但杨过最终成为了一代大侠，这与他的至情至性是不可分割的。杨过的价值体系完全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他对于善恶的评判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其中，杨过与欧阳锋相遇的一段尤为动人。“这几年来，杨过到处遭人白眼，受人欺辱，那怪人与他素不相识，居然对他这等好法，眼见他对自己真情流露，心中感动，纵身跃过，抱住了他脖子，叫道：‘爸爸，爸爸！’……杨过固大为激动，那怪人察觉他叫声出于真情，却只有比他更加欢喜。……此时两人心灵交通，当真是亲若父子，但觉对方若有危难，自己就为他死了也所甘愿。”只因为孙婆婆对自己亲切友善，便愿意为其而死。在他的价值体系之内，只要是真心对自己的人便是好人，自己便是不要性命也要保护他们，这是杨过真性情的一面。在小龙女跳崖之后的十六年内，神雕大侠的名声响彻江湖。但杨过能够被称为“大侠”的原因却是因为他不光急人所难，而且以惩治贪官、为民除害为己任。因此，他可以称得上是“侠”的行为，事实上是与郭靖一脉相承的。杨过原本怨恨郭靖黄蓉夫妇害死自己的父亲，想要杀郭靖报仇，但最后被郭靖拼命救护自己而深受感动，又感于郭靖义薄云天的大气，因此放弃了报仇的念头，逐渐开始以郭靖的标准行事。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杨过内心价值标准的改变，直至最后他杀死蒙古王爷成就一世英明，也不过是有感郭靖的恩德、并且钦佩郭靖为人的结果，要不然也不会在建功立业之后甘愿与小龙女隐居活死人墓，过着平淡的生活。在杨过身上，至真、至情、至性、自由和自主与“侠义精神”并存不悖，这是“侠”的概念由《射雕》向《神雕》的转变，但“儒家的侠”为国为民的

本质并未改变。在杨过的身上，“情”与“侠”这一阴一阳虽然是不冲突地同时存在的，但也是呈一个分离的态势。在小龙女跳崖的十六年里，杨过尽管思念之情丝毫没有衰减，但这些行侠仗义之事也与情爱无关，更不似郭靖那样受到情爱的羁绊，阴阳虽不相容，但已可并存，这是由“儒家的侠”向“道家的侠”转变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到了《倚天屠龙记》时，“侠”的内涵发生了进一步的转变，这是金庸对“侠”与“情”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的表现，主要体现在张无忌这样一个聪明但生性憨直、轻信他人、优柔寡断的人身上。他的所作所为无不是出于至情至性，因为纪晓芙待他亲切和蔼，便可以为了完成纪晓芙的嘱托多次冒奇险将杨不悔送到杨逍身边；为了常遇春待他的真诚和恩情，便可以在烂泥中和他一同受苦难，这些极富“侠义”精神的举动，事实上都是以“情”为支撑点的，他并不会以“侠义”自居，而是把自己的行为简单地视作受人恩情、尽人所托而已。“张无忌道：‘纪姑姑没将我瞧低，才托我送她女儿来给你。若是我有所求而来，我这人还值得托付么？’他心中在想：‘一路上不悔妹妹遭遇了多少危难，我多少次以身相代？倘若我是贪利无义的不肖之徒，今日你父女焉得团圆？’只是他不喜自伐功劳，一句也没提途中的诸般困厄，说了那几句话，躬身一揖，转身便走。”也正因如此，他的纯朴、真诚、善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尽管因为缺乏心机而显得没有政治头脑、因为宅心仁厚而优柔寡断，但仍不失为“侠”。在张无忌的身上，“情”不再与“侠”相对立，而是“侠”以“情”为支点，“情”因“侠”而愈发动人。这正暗合了“阴”与“阳”相济相合的道理。张无忌得了张三丰太极拳的精要，将“道”之精髓完全掌握，这也是对侠和情、阴和阳相容的暗示。

《天龙八部》之中，萧峰起初将建功立业、保家卫国作为个人价值的标准，在他发现自己身世之前也一直都以这样的信条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以致“大侠”的名号在江湖上越传越广。他一直对自己汉人的身份坚信不疑，将辽人视作十恶不赦的恶棍，然而造化弄人，一夜之间自己居然变成了辽人，且自己一直以为是同胞的汉人居然是残害自己父母的元凶。他心中所有对自己、对善恶正邪的评判瞬间崩塌了。聚贤庄一役萧峰为了萍水相逢的小姑娘阿朱而双手沾满了无辜汉人的鲜血，事实上，也正是他价值观崩塌的表现之一。尽管萧峰慷慨仗义，喜欢意气用事，但在知道自己身份之前也绝不会做出这样滥杀无辜的事情，是自己心中信仰的崩塌才最终酿成了这场血战。阿朱出现在萧峰的生活中是他人生的又一转折点，他头一次感受到了人间真情惊心动魄的魔力。之前虽然他的养父母、师父都对他极好，但直到后来他回想起来才发现这些人多多少少都有些怕他，对他很是客气。他想报完父母之仇后就跟阿朱去塞外隐居，从此做一个独善其身的“道侠”，但命运再次捉弄了他，他打死了挚爱的阿朱。阿朱的牺牲起初更加汹涌地燃起他的复仇之火，但随着自己在宋辽边界目睹了宋人对辽人的迫害以及之后父亲

和仇人慕容博了却尘缘、遁入空门，他最终明白了阿朱的一番心意。最后，他的自杀正和阿朱选择死亡相照应，期盼以自己的死来化解仇恨和苦难。萧峰的生世悲剧其实正暗示着“儒侠”的消亡，是对儒家等级制度、礼制的反讽，最后萧峰终于领悟到了众生平等的真谛，也终于明白了世间真情最深刻的含义。“大爱”的含义由郭靖至萧峰发生了由对国家的爱至对天下苍生的爱的转变，发生这样转变的原因也正是基于阿朱无私的爱在萧峰接下来的人生遭遇中不断发酵、酝酿的结果，最终使得萧峰演化成了一个悲天悯人的“佛侠”。在萧峰身上，“情”成为了促进其成为一个真正大侠的原因，也是其侠义一生最后壮举的催化剂。萧峰的一生正是由“侠”之阳刚与“情”之阴柔相冲突并且“侠”胜过“情”的儒侠，到实现“侠”之阳刚与“情”之阴柔融合的道侠，最后到佛侠——看似无情，实际上却含有对芸芸众生的大爱，化解了侠之阳刚和情之阴柔之间的分歧，比道侠“情”与“侠”二者的相济相合更进了一步，实现了二者的共生^[2]。

到了《笑傲江湖》，与上述小说最大的差别在于时代背景被淡化了，从根本上杜绝了效忠皇帝、效忠国家的儒家价值观。主人公令狐冲既有杨过洒脱的真性情、又有张无忌的善良憨直，因而极富人格魅力。《笑傲江湖》一书尽管没有强调历史背景，但却充满了政治隐喻，写尽了政治中人性的贪婪、伪善和虚荣，同时歌颂了急流勇退的行为。令狐冲代表了金庸笔下“道侠”的最高境界，将“侠”之阳刚和“情”之阴柔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出于对师父的爱，他把素不相识的仪琳也当做自己的师妹，并且可以为了她舍弃性命大战田伯光；出于对任盈盈的感激，他甘冒奇险和任我行与向问天一起智斗东方不败；出于对两位师太为己牺牲的愧疚，他可以不顾天下人的眼光出任全是女尼的恒山派掌门……他所有的“侠义”之举事实上都是以“情”为支撑点的。但是，令狐冲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尽管武功冠绝天下，仍然保持着一颗率性而为的赤子之心，在自己权力最稳定的时候急流勇退，甘于隐居西湖梅庄和自己最爱的人一起过平淡的生活。事实上，也正是这点成就了令狐冲真正的大侠身份。位子坐得越高，人便越可怕，这是《笑傲江湖》想要揭示的道理之一。没有“情”在背后支撑，那些建功立业的想法最终会让人误入歧途，不可能成为万人敬仰的大侠。任我行和东方不败在上位之初都怀着振兴神教的雄图大志，但最终都沉迷武功而渐渐变得无情、丧失了人性。只有发乎情、止乎情，才能成为真正的大侠。“侠”不离“情”，“阳”不离“阴”，只有实现了阴阳调和，把握天道的规律，方能成为大侠。

《鹿鼎记》一书被称为“反武侠”小说，主人公不但油嘴滑舌、阴险狡诈、俗气不堪，而且丝毫不会武功，只会逃跑^[3]。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韦小宝都与“大侠”的标准相差甚远。但正是在这部封笔之作中，金庸写出了现代社会中最真实的人，而正是这份坦率不做作的真实成就了真正意义上的侠。《鹿鼎记》尽管将时代背景定在了康熙年间，但事实上却与国之大计、建

功立业毫无关系，单写人性之复杂，这就比时代不明的《笑傲江湖》更高明了一步。这部小说中有胡逸刀的痴情和归辛树这一类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豪杰，但这类人物却是悲剧性的，甚至可以从书中情节的安排看出一些讽刺意味。相反，正是有着人类最真实的七情六欲、贪生怕死的韦小宝最后大获全胜。读《鹿鼎记》再也没有之前各书的热血沸腾，而是充满了现实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色彩，在韦小宝身上似乎可以发现人性中可爱、懦弱或是丑恶的一面。但是，金庸没有丑化韦小宝这种最本真的状态，没有丑化人性之复杂，而是将最真实、最本质的一面展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是像韦小宝那样的“丑侠”，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挣扎着，想要活下来；我们有控制不住的贪欲和情欲，我们永远无法做到视死如归^[4]。但这并不是人性的丑恶，真正的丑恶是我们掩盖自己人性中种种贪婪的欲望与情感，企图建立起一种虚幻的完美人格。在《鹿鼎记》中，“侠”与“情”都不再纯粹，而成为了现实世界中一碰即碎的道义和爱情的真实的反射。事实上，我们每个人是这样现实的“侠”与“情”的统一体，这两者在我们人性之中结合得是如此紧密，以至于我们无法将他们完整地从中提取出来，压制其中任何一部分都会让人痛苦不堪，同时，在二者结合的过程中也滋生了种种更复杂的、美好或是丑恶的品质。只有当我们接纳自己人性的完整与复杂、正视自己人性中所有的美好与丑恶时，个体方能实现真正的自由，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侠士。

纵观金庸的创作轨迹，看似是从“侠”向“非侠”、“反侠”转变的进程，实则是金庸对于人性的复杂性认识一步步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侠”由起初的压制“情”到之后的与“情”相互依托、相辅相成、再到最后的密不可分，从而达到了真正自由的、个人主义的“侠士”境界。

注释：

[1][4]朱露露.论金庸小说的侠义形象[J].安徽文学(下半月) 2013(10)

[2]胡雪峰.儒家文化视角下金庸小说侠义精神内涵及其表现形式探析[J].时代文学 2009(08)

[3]韩云波,何开丽.再论金庸“反武侠”:终结还是开端[J].江汉论坛 2006(12)

参考文献：

[1]金庸.射雕英雄传[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

[2]金庸.神雕侠侣[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

[3]金庸.倚天屠龙记[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

[4]金庸.天龙八部[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

[5]金庸.笑傲江湖[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

[6]金庸.鹿鼎记[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高启斌，台北艺术大学硕士，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博士候选人

王斌，北京大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实习编辑：郭欣欣